

试论罗素的史学审美思想

陈颖

(长沙理工大学 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20世纪50年代,在参与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的过程中,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史学的服务对象、学术方法和所存在的缺陷方面所提出的一应观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揭开了史学应是审美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不能有效地使自己的读者进入审美的境界,即不能使他们通过对史学著述的阅读,来获得“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喜悦,是当代史学在形态建构和成果具获上的一个严重的缺失。

关键词:罗素;史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2-0078-06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之间,西方史学界曾发生过一次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争论。其中,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虽不是史学家,但作为一个在本专业卓有成就且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兴趣的著名哲学家,亦以《历史作为一门艺术》为题的演讲参与了这场争论,并由于所持观点的鲜明和论述的不拘一格而成为这场争论中影响颇大的人物。以今天的眼光看,罗素在这场争论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诸如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1](P159)在历史中发现因果律“并不是赋予历史研究最高价值的东西”,^[1](P160)“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1](P161)等等,都是不甚妥当的。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通过参与这场争论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贡献。这当中,最为突出的又莫过于他围绕着史学是一门艺术的观点所作的论述。因为正是这些论述,虽非直接但却确凿无疑地从史学的服务对象、学术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等各方面证明了这门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审美的,而恰恰这一点,对于已相当程度忽视了这一重要功用的当代史学来说,无论在形态建构还是成果具获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服务对象究竟是谁,这无疑是一个每一个史学家都应回答的问题。然而,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会说史学的服务对象就是他们自己,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量事实表明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人们只要看看时下史学著述的接受表现就会发现,但凡符合史学学术规范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业内人士的读物,很少引起过其他人的兴趣。正是基于此,罗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罗素认为,史学不只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为史学家而存在的,作为一门学问,它的成果乃是“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想望的一部分”。^[1](P159)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历史是为历史学家们写的”,而是相反,“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P164)

毫无疑问,罗素的上述观点是很有道理、甚具效用的,因为它们不仅指出了当代史学所存在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狭义的史学主体实际上已很大程度取代了广义的史学主体,而且为史学补救自己的缺失、重新赢得发展和繁荣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指明了途径。只是,人们若能细付一下,就又会发现,罗素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却并不止于此,而是还揭示了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那就是审美。罗素在认定史学很大程度是为一般人而不仅仅是为史学家服务的同时,还

收稿日期:2005-10-10

作者简介:陈颖(1951-),男,湖南长沙人,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

指出了这门学问能够服务一般人的原因,即它作为不完全属于以探寻因果关系(罗素将此戏称为寻找和使用“乘法表”)为宗旨的科学的“一个不同的范畴”,所关注的东西很大程度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相形之下,“乘法表虽然有,却很难叫做美。”^[1](P158)

史学是审美的?这一观点赖以提出的根据就在于它关注的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这种体现着美的东西?乍闻此语,历史学家肯定会有所疑问。的确,自从史学步入科学殿堂以来,其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它系一门揭示历史的本质、探索历史的规律的学问(亦即罗素有条件地承认的一门以探寻历史的因果关系为主要功能的学问),至于审美,则因为总是与艺术联系在一起而不大为史学家所提起。然而,这种疑问尽管有其道理,即尽管依照传统的观点,“历史不是文学……一些读者可能如他们读小说一样在阅读历史著作,但史家的基本义务……要尽可能以精密和完善的证实的方式来为人们认识关于过去的知识做出贡献”,^[2](P263)但所能得到的解答却未必就是肯定的。因为史学的功能诚然如上所言,并不仅仅止于此,而是还应尽可能地关注历史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并将它们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来,以此使自己的受众除了获得理性的启迪之外,还能获得情感的愉悦。或问,史学为什么应这样呢?显然,这除了它作为一门学问,能够在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的同时,亦能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从而能把握住和反映出历史事物的感性形象,使自己的受众由此开展起审美活动外,更重要的一点,乃是在于作为其认识对象的历史虽然是一消逝了的人类运动过程,但在未消逝的时候,却是一生生不息的客观存在,曾表现为各种鲜明、生动、能引起人们的审美愉快的感性形态,即马克·布洛赫所谓“千姿百态,令人消魂”^[3](P10)的那种对象性存在。正是因此,史学不欲完整、准确把握和反映自己的认识对象则罢,如欲做到这一点,便应通过自己的工作,将历史事物的感性形态尽可能地再现于自己的受众面前。至于它一旦这样要求自己并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则实际上便体现出了审美的效能,从而能够赢得史学家之外的更多读者。

然而,很可能又有人发问了:诚然,史学的功用确乎如上所言,但罗素所谓史学不同于探寻因果关系的又一种功用只是“关注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即便使用了美这个字眼,也只是对不能观照和反映这种令人愉悦的感性形态的“乘法表”而言,这又怎么能使史学与审美挂起钩来?的确,单从字面上看,是很难发现“关注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与审美的同一性的。只是,他们若能对审美作一稍微深入的辨析,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为所谓审美,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关注审美对象的形式要素和结构方式的认知活动,而是同时还对审美对象所寓含的深厚意蕴有所感悟和理解的心理活动。至于这种意蕴,则一如大多数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乃是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是说,所谓审美,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人们审视那些能够引起自身精神愉悦的客观事物,感受它们的形式要素和结构特点,但究其实质,却实为观照对象物寓涵在形式要素和结构特点内的社会历史意蕴,观照藉由客观的事物所表现出的人本身的本质力量。正是因此,即由于所谓美确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当年在探讨美学的一应问题时,才既从本体论的方位切入,提出“劳动创造了美”的观点,又从认识论的角度予以了辨析,指出审美活动的实质是“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P97)以此为我们将罗素“关注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之观点理解为对历史的审美提供了认识对象上的条件。

问题辨析到这里,显然已很清楚了,即罗素在谈到史学的功用时虽然只是说它应该、亦能够关注“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但实际上却涉及到了审美。因为所谓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无非是人生存的方式和方法,是人怎样才能与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结成和谐的关系,使自己获得最大的自由,而恰恰诚如无数哲人早已指明的那样,审美这种“具有解放人的身心的性质”(黑格尔语)的活动,是人与客观世界结成了和谐关系的体现,是人具获了这种自由的象征。试想,如果不是“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人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能说自己具有了“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如果不是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人能够获得实系欣赏自身本质力量的审美愉悦?能说自己在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在内的客观世界结成和谐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最好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审美是对自己生命活动和生存方式的成功的肯定,而这种成功又实际上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的具获、运用的结果,因此,在“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和审美之间,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也因此,罗素虽没有明确指出史学的功用包含着审美,但却通过关注“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这一说法,间接但却确切无疑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以此表明了自己在史学的功用究竟为何的问题上不同一般人的见识。

当然,关于史学应当审视历史的美,以此来感悟“有关人类命运的基本智慧”,从而争取到除史学家之外的更多的读者,最终成为一门在服务对象上无有太多遗憾的学问的想法,并非罗素所独有。象被学术界公认系对当代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产生了极大影响的海登·怀特,就不仅以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系统地表明了与罗素极为相近的思想,甚至提出了“历史若文学”、“史学家表现出一种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5](P24)等在史学界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观点。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因为在历史著作的叙事形式上提出了“历史叙事=文学叙事=虚构叙事”这样的模式,因此,不少人认为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是历史学“叙事转向”的标记,或者说是后现代史学的发源地。然而,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罗素的表述就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就不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关注。须知在史学的功用究竟为何的问题上,罗素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怀特,他不是从叙事方式的层面上来讨论史学的形态,而是着眼于史学的受众,最后落脚

在了史学的认识对象上面,也就是说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更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哲学家,对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思潮在学术界居独大地位(这个时代甚至被视之为“分析的时代”),由此使得“分析”式历史书写一直占据历史哲学界及科学史学界的主流的情况,不可能无有了解。而这就意味着,他的上述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他极有可能为此会遭到来自哲学界的“讨伐”,故而从一开始就要为应对这种可能的批判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

如同史学的服务对象一样,史学的方法也是一个为史学家们讨论过无数次的课题。而且由于方法不仅极大地决定着史学形态的建构和成果的具获,还很大程度影响着人们对这一学问的接受态度,因此,史学家对方法的强调一度达到了超过其它任何问题的程度。如实证主义史学就认为,历史的进化虽有其内在的“法则”,但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方能求得,^[6]故此,“科学之可贵,不在其出品,而在其方法也。”^[7]那么,在这一问题上,罗素的表现又如何呢?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哲学家,他居然没有习惯性地对这一学术性很强的问题进行一番概念、判断、推理的工作,而是如拉家常一样,以极为浅显的话语道陈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谈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方法,而是最具体的写作方法。如在谈到历史著作究竟应怎样写时,他便这样说到:“历史应当怎样写,才能在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中产生尽可能好的效果的问题。这里首先有一个极其简单的要求,那就是历史必须是有趣味的。我的意思是说,历史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知道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好的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都感到兴趣。”^[1](P165)

也许,在某些看重研究工作的学理性、尤其是强调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史学家眼里,罗素的上述话语是很难称得上有什么分量的。因为罗素在为自己认为是很重要的写作方法所给出的说明是,以这种方法写出的作品是“有助于那些非历史学家的精神生活”的,而且正是因此,它们方“必须具有专业性著作所不需要的某些特点。反过来说,它也不需要有人在学术性专著中所要寻找的某些东西。”^[1](P164)只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罗素的这些看法虽不入于绝大多数强调史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史学家的法眼,却表明了一个很有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史学应是审美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罗素在这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在史学的方法及所产生的效果上对趣味的看好,而趣味从来就是审美的要义所在。

众所周知,所谓趣味,乃是一种使人的精神感到愉快的情趣和兴味。由于它的产生离不开作用于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各种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的结构形式和内在意蕴便成为了引起人的兴趣的重要条件。那么,在人的社会生活当中,哪些事物最能引起人的兴趣?无疑,它肯定、也只能是那些美的、给人以赏心悦目以至消魂夺魄的感受的事物。其所以这样说,不单是为着从这些事物本身来讲,其得能引起人最大兴趣的美,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显现,而人最大的精神需求,无过于通过对各种客观存在着的美的事物的观照,来达到对自身本质力量的肯定,而且为着从人的感觉来说,其“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化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P126)这里,就以一般人对历史的关注为例:尽管他们这样做确乎是事各有因,但人们只要将这种种的原因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当中,历史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美以及人们因此产生的兴趣无论如何是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美及由此所激发的关注者的兴趣比之历史寓涵的规律及人们探索、掌握这种规律的热情还要大。如果构成历史的人物和事件不是美的(无论是壮美还是优美,悲剧、正剧亦或喜剧,等等),其场景和过程不能使人从中看到自身的本质力量、感悟到“有关人的命运的基本智慧”,如何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能使他们对包括自己的活动在内的整个人类的过往运动历程有所眷顾?反过来,人们如果不是依靠使客观世界“人化”的进程所形成的感觉,他们怎么能对历史上那些实际上体现着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美的事物产生兴趣、与之发生谐振,以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对历史所寓涵的规律的探索?也许有人会说,在现实事物面前,人们的态度确乎很大程度取决于趣味,但在历史面前则不一定,因为以对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就不会如此,云云。但他们不应忘记,罗素在这里讲的主要是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是在他看来舍此历史学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和繁荣的广大受众。而且就是历史学家,就是那些面对着没有或很少形象表述的史料,进行着辩因究理的工作,因而以理智、冷静为工作特点的专业工作者,真正在经由对他人的作品的阅读,接触到历史上那些美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的时候,同样是能够产生极大的审美愉悦,从而使自己即便只是经由职业的选择所产生的兴趣亦能得到很大的加强。比如他们在阅读诸如司马迁之《史记》等类作品时就同样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并认为“《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咱们的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写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司马迁是这方面的典范”,^[8](P508)以此明确地表明了一种赞赏和欲于借鉴的态度。至于他们之所以如此,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他们除了是历史学家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具有和其他人相同的感受,能经由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种活动获得精神愉悦的人。

此外,还须一提的是,在怎样写史的问题上,罗素还提到了感情的问题,他认为,如欲使人们对历史感兴趣,“这就首先要求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述的人物应该怀有感情”^[1](P165)。而这同样是我们认为他实际上表明了

史学是审美的这样一个观念的重要的依据。因为稍具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感情是审美心理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不仅广泛地渗入感知、想象、理解等心理因素之中,使整个审美过程浸染着感情色彩;而且是触发这些心理因素的诱因,能推动它们的发展,起着动力作用。至于感情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最根本的一点乃是在于它和认识不同,不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而是人对自己与周围世界所结成的关系的反映和评价,以及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主张、活动的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这里就以人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态度来说:只要他们对后者怀有如罗素所指出的某种感情,实际上便表明他们对历史进入了一种审美的状态。因为他们这时的态度已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客观存在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而是对自己与这些客观存在所结成的关系的反映和评价;在这种反映和评价中,他们要求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已不是(至少不单是)它们是否是真实的,而是它们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尽管这些需要和理想中包含着他们对它们理性的、社会性的评价。

自然,对罗素提出的史学家在写史时应怀有感情这种说法,肯定会有不少史学家心存疑窦。因为在他们看来,史学无疑应是一门科学,而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按科学的规矩行事,即在进行研究时应始终保持理智和冷静,尽可能地排除感情的干扰,以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即便研究者有感情活动,也只能是在研究过程之外,如取得了成果后感到兴奋、激动等等,而不是渗透在过程当中,更不能听由它支配研究者的行动。只是,这种疑虑虽有其道理,实为另一个问题,即史学的属性和品格的问题,与此处所辨析的对历史怀有感情是史学具有审美功能的必要条件不是一回事。而且就是说到史学的属性和品格,也并非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因为作为这门学问的对象的历史,虽然是一客观的存在,但却并非自然界那种完全与人无干的对象世界,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和氛围,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9](P321)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史学即便是一门科学,在属性和品格上亦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由此使得作为其主体的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活动时完全与情感绝缘,使审美与史学毫无关联。实际上,也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实情的正视,一力倡导“史学革命”的鲁滨逊方将此作为变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学的视野的突破口,指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作为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述一个最平凡人物的习惯与感情。”^[10](P3)而这与罗素之观点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

同一切事物一样,史学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而总是会存在着某些缺陷,只不过这些缺陷会因人而异,即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罗素这位大哲学家的眼中,史学的缺陷是什么呢?那就是它“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地有吸引力了”,就是“一般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在本世纪中已经衰退”。正是因此,他便“对这种衰退感到极大的遗憾”,^[1](P172)认为有必要予以补救。

怎样看待罗素的这个观点?首先应当承认,它是客观的、站得住脚的。因为它处的情况姑且不论,单是在中国,很早以来,“对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史学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小”^[11],以致上世纪80年代某些学者一度竟惊呼史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人们对罗素这个观点的理解和体会却不能仅止于此,还要看到另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它虽没有明确道出但实际上却表明了史学应当是审美的这一极为重要的观念。至于根据,则在于他在指出史学越来越失去受众这一事实的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那就是,除了“部分地是因为当前的生活充满着这样多的重要事件,而且充满了如此迅速更迭着的变化,以至很多人既没有时间,也不想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以往的世纪”等之外,还由于“历史的皇皇巨著越来越少了”,^[1](P172)也就是说,现时历史学“对于学术的贡献表现在期刊上,而不在一本本的书”^[1](P174)

人们对历史兴趣的衰退主要在于“历史的皇皇巨著越来越少”?而且正是这一原因使人们能够推论出史学应是审美的观念?乍闻此语,但凡对史学的状况有所住心的人士肯定又会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有所疑惑了。因为当今之际,经由期刊发表的单篇论文虽越来越成为史学著述的主要形式,但大部头的著作仍然不少;而且罗素在谈到史学何以会衰退的时候,曾列举了生活中充满了迅速更迭着的变化、很多人没有时间等原因,既然如此,这些人又怎么可能有意兴和闲暇去阅读“皇皇巨著”呢?更何况即便所有情况都一如其说,与史学的审美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他们若能于疑惑之余,再仔细体味一下这一说法时,又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不仅很有道理,而且确乎是罗素具有史学应是审美的观念的又一有力的证据,因为比较过去,时下的大部头史著至少在相对数量上确乎是已少了许多;尤其是推敲一下罗素所谓“皇皇”的意思之后,就会发现,这一形容词指的并不单是(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史学著述的形式,而主要是指它们的内容,其中又特别是指历史给人的美感这一最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东西。

说到史学著述,但凡对史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其主要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表现的。具体说来,即在古代史学那里,著述的主要形式多是大部头的著作,如中国之《史记》、《汉书》,西方之《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等,而进入近代以后,多是单篇的论文,由此使得学术期刊同在其他学科那里表现出的情况

一样,成为了史学赖以展现自己学术成果的主要阵地。然而,对不同时期的史学著述的区分尤其是对读者兴趣的产生来说,形式尽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却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人们若要真正区分不同时期的史著尤其是追究它们在读者与史学的关系上的作用,就得于形式之外,还体认和辨析一下它们的内容和特点。当人们对古今中外所有史著尤其是那些大部头的史著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体认和辨析时,他们不难发现,但凡能够吸引一般读者的大部头史著,如中国之《史记》,西方之《罗马史》,等等,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反映历史时,鲜有舍弃感性形象的。也就是说,经由它们的表述,读者看到的多是鲜明、生动的历史画面,是能够引起他们的审美愉悦、由此产生极大的接受兴趣的东西。即便这些著述也要做辨因究理的工作,即今人所谓探讨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规律,等等,亦多是“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12](卷 26)很少有像今天的史学家写论文时作高度抽象思辩的。反观近代以来的史学著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这当中仍有少数的能留心一下历史的感性形态,或多或少反映一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形象,但无论大部头的著作还是单篇论文,绝大多数的只是对历史做三段式的论辩。也就是说,历史在它们的笔下,已被“抽象成一种简单的公式”,其“丰富性、生动性全被舍弃掉了”。^[11]这样一来,不仅“风云变换、绚丽多姿的历史简化为经济、政治范畴的人格化”,^[13]而且读者也由于面对的是干巴枯燥、无血无肉的对象而难以获得审美的愉悦。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读者仍能像过去一样,对史学保持浓厚的兴趣、持具热情的态度,显然是勉为其难和不太可能的。

由上,可知罗素所谓缺少皇皇的历史巨著,并不是一般性地指缺少大部头的历史著述,而是指缺少对历史的感性形态做鲜明、生动的反映,以此来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的著述;而一旦人们能立足于这样一种认识去体味罗素话语的意蕴,则不难得出,他对一般人读史兴趣衰退原因的解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他在思想上具有史学应是审美的观点亦是明白无误的。尽管对今天的史学来说,探索和把握历史规律确乎是第一要务,但这种工作在一般人那里,毕竟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迫切的,相反,倒是有所否令其感到愉悦的东西才是最能使他们产生和保持浓厚兴趣的原因所在,既然如此,史学若要保持足够的受众,避免史学家担心的衰颓,便不能不向自己提出鲜明、生动地反映历史,从而成为一门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学问的要求,便不能只以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问,抽象地论辩历史为唯一的旨趣和最大的满足。正是因此,罗素说今天史学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缺少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普鲁塔克以及塔西佗等史学家的大部头著述,无疑是很有道理和甚具识见的。正是这一点,证明了罗素的表述不仅是对史学衰颓原因的一个符合事实的解释,而且是对史学功用的一个最好的揭示。在罗素的表述中,今天的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认识是,史学应是审美的;至于具有和体现了这种功能的史学所能展示给读者的历史,则应当、也只能是理性内涵和感性形态统一的人类过往运动过程,而不是时下已为人们厌倦了的那种完全用概念堆砌起来的、干巴枯燥的对象世界。在如何反映历史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住读者,从而使史学于受众方面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问题上,今天的史学家从罗素的话语中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启示,无疑是史学应当是审美的这一观念。当然,基于各人的认识,今天的史学家不可能在思想和行为上和罗素做到高度的同步,但由于他的话语确乎道出了问题的真谛,因此,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了不少史家的呼应。比如在西方,劳伦斯·斯通就通过《叙事的复兴:对于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一文指出,历史书写应该“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由此举起了“叙事史学”^[14](P93、105)的大旗,以致有史家认为,“历史在此被视为美学的一支,而非社会史的女佣”。^[15](P45)至于在中国,亦有于此感觉敏锐的学者指出:人们的反映历史,“既需要从个别中展示一般,也需要从一般中展示个别”,特别是“它展示的一般规律决不应是单色调的僵死公式,而应是包涵着人类历史全部绚丽多姿特性于其中的、经得起任何史实验证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规律;它所展示的个别性既不是与一般规律无关的、绝对非理性的个性,又不是没有个性特征的数字或样品,而是既有规律性又充溢着个性特征的、其精神感染力不逊于艺术品的个性。”^[16]

“今天作为学科的历史学的处境很不妙,因为它丧失了自己在文学想象力中的起源。为了表面看起来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历史学压制和否认了自己最伟大的力量的源泉和更新力量。如果我们把历史学科重新拉回它同其文学基础的密切关系的话,我们便可以警惕单纯的意识形态的歪曲。我们应该掌握关于历史的‘理论’,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历史就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学科’。”^[17](P179)这段话出自海登·怀特。它虽然比罗素的陈说迟了若许年,且切入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亦不尽相同,但在内涵上却与后者的观点表现出了很大的同一性。至少,它以自己时下史学处境的看法证明了罗素当年的论断有着极大的合理性,证明了失掉了审美的功能确乎是近代以来史学的一个重大缺陷。

参考文献:

- [1] 张文杰.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选[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2] Arthur Marwick.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M]. Great Britain: Palgrave, 2001.
- [3] 马克·布罗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4]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海登·怀特. 旧事重提: 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书写历史: 第 1 辑[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6] 鲍绍霖. 文明史怪杰博克尔的史观及其影响[J]. 史学理论研究, 1993, (3).

- [7] 缪凤林. 论历史法[N]. 时事新报, 学灯. 1921-01-28.
- [8]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9]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鲁滨逊. 新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11] 赵世瑜. 史学的出路在于观念更新[J]. 史学理论研究, 1986, (6).
- [12] 顾炎武. 日知录(四库全书本)[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3] 朱本源. 在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J]. 天津师大学报, 1986, (6).
- [14] 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J]. *past and present* November, 1979, No. 85.3-24. 转引自陈新. 论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研究的两个阶段[J]. 史学理论研究, 1999, (2).
- [15] 亨特. 新文化史[M].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2.
- [16] 庞卓恒.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J]. 历史研究, 1988, (1).
- [17]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任东波

On Russell's Aesthetic Thought on Historiography

CHEN Ying

(Lao School, Changsh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76, China)

Abstract: The famous English philosopher Russell participated in the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history is a science or an art" in the 1950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 Russell put forward some important viewpoints about the service object, the academic approach and the limitation of history, which indicated the fact that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aesthetic. The severe faul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ality and the acquirement of production is that history authors cannot let the readers get into the aesthetic circumstance effectively, i. e. readers cannot achieve the joy of "the substantial power of intuition" by reading works on history.

Key words: Russell; historiography; aesthetic